

乔治·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以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为例

高晓鹏

(四川外国语大学 翻译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社会交际行为使不同语言文化中的群体交流成为可能,在翻译过程中,要想使得原作中的文化特色和所隐藏的含义淋漓尽致地展示出来,这就需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而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四步骤无不蕴藏着译者主体性的特征。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的翻译过程中是如何施展译者的主体性作用,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国文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

关键词:乔治·斯坦纳;译者主体性;阐释学;葛浩文;《红高粱家族》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7.09.027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7)09-0027-05

一、引言

《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之一,该小说从本土出发,以抗日战争和高密民间生活为背景,讲述余占鳌的抗日游击队及“我”奶奶和爷爷之间的故事。自1993年经葛浩文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深受英美读者喜爱,尤其是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迎来了“莫言热”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这显然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经典译作,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模范。莫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发挥,也是当今译界所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因此,笔者以斯坦纳阐释学的四步骤为依据对葛浩文的《红高粱家族》英译本深入分析,认识到译者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发挥更有助于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与接受。

二、译者主体性

传统的翻译学理论一直将“忠实”奉为翻译实践的圭臬,认为只有完整再现原作的译文才是最优质的,正是因为过度强调原作和原作者的核心地位,给译者冠以“媒婆”、“翻译机器”、“原作的奴隶”等名号,把译者置于边缘化的从属地位。从翻译的发展趋势来看,译者必须要从“原作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让译者获取自由,拥有与原作者一样的同等地位。一方面,翻译是一种复杂的交际活动,受到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源语和目的语的诗学特征以及译者个人素质、知识视野等多方面的影响,若纯粹以“忠实”为目标进行语言上的对等转换,对于译文效果可想而知会大打折扣,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势在必行。另一方面,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理论研究产生了文化转向,译界学者对翻译有了新的认知,研究领域更为广阔,翻译实践不再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的转换,文化上的对等交流成为翻译的重要任务,这需要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才能实现。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运用自主性、能动性以及使用比较贴切的、符合目的语读者群体能接受方式的语言再现原作;译者主体性的主要特点在于译者在翻译时必须理解原作,把握原原本

* 收稿日期:2017-04-27

作者简介:高晓鹏(1992—),男,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质含义的前提下,结合其翻译目的、功能及目的语的语言特色等因素,发挥个人想象力和创造力再现原作,达到跨文化交际目的,因而译者应当被给予一定的权力和自由以发挥其主体性作用。翻译学的众多学派都涉及到译者主体性的问题,如功能学派的目的论强调人类任何行动都是有目的的,而翻译也是目的行为之一,译文要满足赞助人、读者群体的目的,要想达到该要求,需要译者主体性的充分发挥;解构主义学派主张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在文化转向之后,对于翻译研究也有重大突破,主要在于它强调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将译者置于研究的核心位置,这大大开拓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新局面;此外,以伽达默尔、乔治·斯坦纳、安托瓦纳·贝尔曼等为代表的阐释学派更加注重译者的主体性,该学派认为翻译需要理解,且理解的过程就存在阐释,而译者的阐释就发挥着其主观能动性,贝尔曼于上世纪90年代在《翻译评论:约翰·多恩》这一著作中提出“倾向译者”的号召。综上所述,不仅在具体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而且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进程中,都会存在译者主体性这一普遍现象。

三、阐释学理论的发展

阐释学(Hermeneutics)又称作诠释学、释义学,该学科专门研究文本的解读、对内容的解释;从词源上来看,该词起源于古希腊的神话中的赫尔墨斯(Hermes),他是神的信使,专门负责理解神的旨意、传达神的意愿。阐释学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浪漫阐释学、哲学阐释学和后现代阐释学等四个阶段^[1],现代阐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乔治·斯坦纳等;施莱尔马赫结合先前诸多阐释学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为古典阐释学的系统化创立了现代阐释学,海德格尔提出“前理解”的概念,而伽达默尔称之为“成见”,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视域融合”、“效果历史”等理论,使阐释学发生了本体论转向,确立了阐释学在哲学范畴的地位。

斯坦纳作为阐释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将他们的思想融入到了翻译研究之中,他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这一对译界影响非凡的经典著作中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并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与支持,这表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的人对同一个作品的理解,哪怕是对自己语言的作品的理解,也是多元的”^[2],我们的翻译活动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呢?因而,在理解的同时也在把原作转换为阐释者所熟悉的语言表达,原作的含义受阐释者所支配,该思想对翻译的解读提供了更为宽泛的视角。在该著作的第五章,他从四个步骤论述了翻译的过程: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每个步骤都无不涉及译者的理解和阐释,以此探究葛浩文在《红高粱家族》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具体情况,可以更好地指导我国文学英译,实现不同国度的文学、文化交流。

四、《红高粱家族》英译的译者主体性发挥

(一)译者的信赖

阐释的第一步在于信赖,所谓的信赖就是要相信原作是有意义的、内容中所包含的信息是可以传递的,在被译成目的语之后,会对目的语的读者和社会产生影响。译者总是要选择有意义的原文,否则就会放弃。^[3]只有当译者信赖原作价值所在并相信一定会有读者所接受时,才会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与情感去理解和翻译。

影响译者对原作信赖的因素有许多,首先是社会的需求。在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历史文化上,译者要相信原作翻译之后是符合目的语读者与社会的价值需求,才会激发译者的动力去翻译,如在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道路,把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成汉语,认为这一定会影响当时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给中国的革命带来了希望。其次,译者对一部作品的信赖还受到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影响。无论对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一位严肃的翻译家定会根据自身真实情况对所要翻译的文本材料做出选择,若作品在译者能力范围之内,那么就会增强译者的自信心和对原作的信赖程度。再次,最为重要的就是译者的兴趣。译者有着双重的身份,既是原作的接受者,又是译作的创造者,只有当译者读了原作之后,对原作品产生了兴趣才会翻译原作传递出所认识到的价值。即使一部作品

的价值、影响力再大,倘若译者不感兴趣,他就不会花时间去阅读和理解这部作品,比如说让一位热爱文学翻译的译者去翻译一部法律文本一样,其结果可想而知,是不会建立起信赖的。

葛浩文之所以愿意翻译《红高粱家族》,主要是当他读到这部作品时就产生了由衷的喜爱。他在与季进的一次访谈中说“我最早读到的莫言的小说是《天堂蒜薹之歌》,……作为他的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作品,《红高粱》会是更好的选择。”^[4]该译作的最终销售预期也很好,达到了葛浩文的预期目标,正是由于他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热爱以及对莫言及其作品的高度认可,认识到该作品价值所在,最终建立起了与《红高粱家族》之间的信赖桥梁。

(二)译者的侵入

在确定原文本言之有物之后,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译者要做的就是阅读和理解文本内容,在理解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剥去语言的表层外皮,挖掘文本的精髓,领会原作的意义和揭示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深层含义。斯坦纳认为“每一种理解行为注定吞并所译的作品”^{[5]314},由于语言、文化、思维、经历等多方面的差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译者作为原作的接受者和译作的阐释者,不可能在译作中把原作者心里表达的所有内涵诠释出来,但是可以把他所认为目的语读者群体需要的意义占领并带到译作中。因此,译者在理解原作和翻译时无法避免对原作的暴力侵占与掠夺,翻译也需要译者发挥其能动性以呈现原作,这正如谢天振所说“理解不是消极地复制文本,而是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劳动”^[6],最终译作中会出现增删、调整、改写、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等现象。

例 1

原文:奶奶那年身高一米六零,体重六十公斤。^{[7]35}

译文:That year Grandma was five feet four inches tall and weighed about 130 pounds.^{[8]39}

这是对奶奶十六岁那年身高和体重的描写,在汉语中对于身高用米、体重用公斤,这种方式中国人很容易理解,但是英语世界读者对于米和公斤的概念不是清楚,他们更习惯于用英尺和磅来测量身高和体重,葛浩文对原作中的汉语表达方式侵入,把译作中的身高和体重分别用英尺和磅取而代之。

(三)译者的吸收

吸收是对原作的转换与阐释阶段,如同巴西的“食人主义”一样,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把原作的意义与形式引入译作中,并内化成目的语的一部分。吸收会带来两种结果,一种是消化,一种是感染。^[9]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译者要做的就是将原作带向读者,译者要发挥主体性,使用目标语读者所熟悉的地道的表达方式再现原作,让目标语读者感受到犹如在阅读本国作品;假若目的语被原语感染,会打破译入语的语言结构特色,改变原先的有机体,如埃兹拉·庞德为了推动“意象派诗歌运动”,采用直译和阐释性翻译的方法将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对美国诗歌进行创新。因而,在吸收的过程中,译者要根据个人目的或者赞助人的目的以及本族语的具体情况“吸收”原文;否则,倘若自身规范系统发展尚在未成熟之前,一味地吸收外来的事物会导致失去平衡和对自我的信任^{[5]316}。

例 2

原文:奶奶死后面如美玉,微起的唇缝里、皎洁的牙齿上、托着雪白的鸽子用翠绿的嘴巴啄下来的珍珠般的高粱米粒。奶奶被子弹洞穿……不忍卒视。^{[7]121-122}(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译文:Even in death her face was as lovely as jade, ...by the emerald beaks of white doves.^{[8]135}

这段是对奶奶去世之后的描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主席给予刘胡兰的评价,莫言在这里也表现出奶奶的伟大,后面也进行了环境渲染,给人一种凄凉忧伤之感,而葛浩文在翻译时对原文进攻,认为这部分不符合外国读者的叙述方式,译文中删去了划线的部分。而对于前面奶奶面部描写方面,译者吸收了原作中的

语言结构与风格,在译文中呈现得淋漓尽致,如原作中“面如美玉”这一比喻被译者保留了下来,再现出了奶奶的神色。

例 3

原文:大风刮不了多日,亲人恼不了多时。^{[7]136}(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译文:Strong winds eventually cease, unhappy families return to peace.^{[8]150}

这是汉语中的一句民俗,意思是“刮大风的天气很快就会停止,亲人间生气很快就会好起来”,文中的“多日”和“多时”表示的是时间,然而外国读者会对这两个时间产生误解,译者侵占原文的意思用“eventually”代替,让目的语读者清楚这是时间副词表示的含义是一样的。这句话也是一种平行结构如“大风——亲人”、“刮不了——恼不了”、“多日——多时”,译者吸收了这种结构特征采用“strong winds——unhappy families”、“cease——peace”,尤其是后者采用韵脚的方式,可以使译文读者了解该句话是一种平行句,达到了作者所表达的效果。

(四)译者的补偿

在前面三个阶段中,由于译者个人的偏好、对原作的误读以及翻译中语言文化的处理不当等,甚至在原作中过度吸收新物质都会造成译入语的不平衡问题,这就需要译者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对译作进行补偿。补偿的目的既要使译文通畅,让读者感觉到犹如原文作者在用译入语进行书写一样,还要凸显出原作的异域特色。在《红高粱家族》的英译文中,葛浩文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补偿翻译过程中造成的语言文化信息的缺失,使该译本符合英语世界读者的心理需求。

例 4

原文:你简直是鲁班门前抡大斧,关爷面前耍大刀,孔夫子门前背“三字经”,李时珍耳边念“药性赋”。^{[7]110}

译文:…wielding an ax at the door of master carpenter Lu Ban, or waving his sword at the door of the swordsman Lord Guan, or reciting 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at the door of the wise Confucius, or whispering the “Rhapsody on the Nature of Medicine” in the ear of the physician Li Shizhen.^{[8]122}

这句话有着共同的意思就是“在行家的面前卖弄本领”,译者本可以用“to show off in the presence of an expert”表示,但这样会埋没文化特色,中国读者对“鲁班”、“关爷”、“孔子”、“李时珍”这些历史人物非常了解,译者把他们吸收到译文中以突出汉语文化,但是英语读者不知所云,这就使译文失去平衡,为了弥补译作中文化信息的缺失,译者又增加了一些词语“carpenter”、“swordsman”、“the wise”和“physician”,英语读者就自然清楚这些历史人物的特点,实现了原作中的文化传递。

五、译者主体性发挥的限度

综合上文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斯坦纳的阐释四步骤对译者的主体性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也肯定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应被给予一定的阐释自由与空间,为施展译者的创造性行为提供了可能。然而文学作品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再现活动,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和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享有一定的权力与自由的同时,也应受到其他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我们说译者是“带着脚镣的舞者”也正是强调对译者行为的约束。首先,译者受到原作的约束,虽然每位译者对原作的认识不同,但是在对原作阐释时不能改变原作的风格和意义,译者要在译作中尽量再现出原作的思想与异域文化;其次,译者的翻译行为受到目标语读者影响,因为译者在进行表达时要考虑目标群体的年龄阶段、受教育程度、文化素养等,比如《格列夫游记》原本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在译为汉语后变成了一部儿童小说,因为它在汉语中的目标读者群体是青少年儿童,所以不能如

同原作一样译成评判性的作品;再次,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性服务行为,使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交流,译者应严格遵守职业规范以保证交流的正常进行,关于译者的职业道德规范安德鲁·切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在“圣哲罗姆誓言”(The Hieronymic Oath)中做了详尽的阐述,包括“精确地呈现原作、减少交流中的误解、分享翻译经验、提升个人翻译能力、为翻译内容保守秘密等”^[10]。

六、结语

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从作品选择、译前准备、语言转换到译后处理等过程中,自始至终译者都发挥着主观能动性,有效地促成了原语与译语、原作者和目标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虽然我们主张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但也要受到原作、目标语读者的期待、译者职业规范等约束。葛浩文《红高粱家族》译本被英语读者群体广泛认同与接受,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之提供了一个范本和借鉴作用;通过斯坦纳阐释学四步骤对葛浩文的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探讨,可以看出如果译者在翻译时像葛浩文那样充分发挥主体性作用,再现原作的语言文化含义,将会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舞台,促进中西方的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 [1] 西风. 阐释学翻译观在中国的阐释[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9(3): 56-60.
- [2] 张隆溪.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81.
- [3]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142.
- [4] 季进. 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25.
- [5]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14.
- [6] 谢天振. 超越文本超越翻译[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115.
- [7]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 [8] MO Y.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M]. GOIDBLATT H Trans.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3.
- [9] 金敬红, 李思国. 斯坦纳和勒代雷的阐释翻译理论评介[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9): 44-47.
- [10] CHESTERMAN, A. 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 [J]. The translator, 2001(2): 139-154.

On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s ——A Case Study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Red Sorghum*

GAO Xiao-peng

(College of Interpretation and Translation,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Translation, as a cross-cultural soci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makes it possible to communicate groups in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translator to show his or her subjectivity about how to completely reveal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dden meaning in the original works. George Steiner's Hermeneutics contains al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Based on this theory, this study analyzes how Hoard Goldblatt casts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e role in his translation of *Red Sorghum Family*, which helps translators to develop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romotes Chinese literature coming into the world.

Key words: George Steiner;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ermeneutics; Howard Goldblatt; *Red Sorghum*

(实习编辑:杨晓玲 责任校对:暮晨)